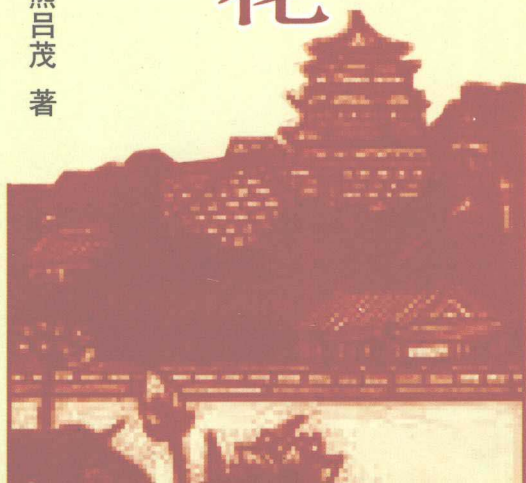


湖湘文化的传承与湖南教育现代化

熊吕茂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书系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课题资助项目
和中南大学文理基金资助项目

湖湘文化的传承与湖南教育现代化

熊吕茂 著

中国文史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湘文化的传承与湖南教育现代化 / 熊吕茂 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7 (东方文化丛书)

ISBN 7-5034-1500-2

I. 湖 II. 熊…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9372 号

湖湘文化的传承与湖南教育现代化 / 熊吕茂 著

- | | |
|------|-----------------------------|
| 出版发行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 社 址 |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
| 印刷装订 | 北京市海淀区唐家岭福利印刷厂 |
| 经 销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
| 开 本 | 850 × 1168 1/32 |
| 印 张 | 8 |
| 字 数 | 200.7 千 |
| 版 次 |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7-5034-1500-2/G · 0244 |
| 定 价 | 18.60 元 |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引 言

湖湘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支灿烂的奇葩,它兴起于湖湘大地,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其发展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屈原。“屈原瑰丽神奇的浪漫诗篇,庄子奥妙宏伟的哲理散文,深深地激荡和哺育着湖湘文化”。到南宋时期,著名学者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继承了古代湘楚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吸收了理学的思辨方法,在湖南各地聚徒讲学,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到了清代,经过王夫之的阐微发幽,旁征博引,使湖湘文化形成了自己完备的思想体系,成为一支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化流派。在湖湘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之下,近代湖南的杰出人才辈出,岳麓书院也因此赢得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美誉。这座“千年学府”相继培养出了一大批对近代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湖南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如地主阶级经世致用派的代表魏源、陶澍;洋务派文化的代表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谭嗣同、唐才常、沈荇;资产阶级新文化的代表杨昌济;等等。这些近代的湘贤

名人,他们的思想和言行,对于湖湘文化的传承无疑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湖湘文化从历史来看虽然是一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理学文化,但是它又有许多不同于其它地域文化的特点,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的辩证发展观与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与忧国忧民的参政意识;等等。特别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更增强了湖南人忧国忧民的参政意识,形成了湖南人一种特有的精神,即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近代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贯穿于湖湘文化的一条红线。在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湖湘文化的熏陶下,近代的湖湘大地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才群体,他们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振兴湖南的历史进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湖湘文化还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几千年来潜移默化地影响、教育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湖湘人。从湖南教育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湖南教育与湖湘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湖湘之地培养了诸如王夫之、曾国藩、杨昌济、徐特立等教育家和魏源、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一大批革命志士,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罗荣桓、李富春、陶铸、胡耀邦、王震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综观具有悠久历史的湖湘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其经世致用与求实尚践的学风、爱国主义的精神、创新进取与求新求变的精神,对于培养当代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思想品德,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如何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的思想精华,对于培养和造就新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教育现代化的前提和目的是人的现代化。而影响

人的现代化的因素是很多的,如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的传承等都对人的现代化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我们认为,对人的现代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却是教育,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在以往传统的教育中存在的重共性、轻个性,重知识灌输、轻智能开发,重理性训练、轻和谐发展,重“本本”、轻“人本”等倾向,对于教育现代化的实现无疑具有阻碍作用。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应改变过去应试教育和灌输教育的旧模式,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加强学生的创新能力,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创新教育制度,推动湖南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协调、稳步地向前发展。为此,我们应继承和发扬湖湘文化中的经世致用与求实尚践的学风和创新进取的求变精神,为早日实现湖南教育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
一、湖湘文化的初步形成	(1)
二、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4)
三、湖湘文化的主要内容	(15)
四、湖湘文化的主要特点	(25)
第二章 湖湘文化主要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	(44)
一、王夫之的教育思想	(44)
二、曾国藩的教育思想	(63)
三、杨昌济的教育思想	(82)
四、毛泽东的教育思想	(90)
第三章 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现代化的关系	(111)
一、湖湘文化对近代湖南教育的影响	(112)
二、湖湘文化对湖南教育现代化的积极作用	(128)
三、湖南教育与湖南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61)

第四章 教育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	(211)
一、教育现代化的实质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	(212)
二、现代西方教育观念的变革	
对湖南教育现代化的启示·····	(222)
三、关于湖南教育现代化的若干思考 ·····	(234)
四、继承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	
奔向湖南教育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239)
主要参考书目·····	(243)
后记·····	(248)

第一章 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一、湖湘文化的初步形成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从地域上讲,“湖”即洞庭湖,湖南位于洞庭之南;“湘”指湘江,湘江纵贯湖南全境。可见,“湖湘”二字完全可以与“湖南”二字等同。从历史上来看,湖南历来地广人稀,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但是,当时这个号称“南楚”的地方,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加之多民族文化的相互碰撞与融合,无论是“雅文化”(精英文化),还是“俗文化”(民间文化),都有相当的发展,并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以“雅文化”而论,以屈原、贾谊、柳宗元、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栻、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毛泽东等为代表,构成了“穷究天人”的哲学思辨传统和瑰丽奇伟的文学艺术传统。以“俗文化”而言,湖湘大地上三湘四水的民风民俗、民众心理等都表现出独特的地方色彩。

湖湘文化的早期缔造者可以追溯到屈原。屈原因不满楚国的

内政腐败,主张改革政治而遭贬谪,被流放在湖湘之地达十年之久。他在湖湘的十年期间,审视社会,思考人生,满怀忧愤和激情,写下了大量诸如《九章》、《九歌》、《天问》、《离骚》等闪烁着奇光异彩的深邃诗篇;像他所写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朽诗句,及其自强不息、勇于探索的精神,被后人永远记取和发扬光大。因此可以说,屈原是湖湘文化最早最突出的缔造者之一。

湖湘文化正式起源于北宋周敦颐开创宋明道学时期。周敦颐(1016—1073年),字茂叔,湖南道州人,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的濂溪书堂讲学,故世称濂溪先生,其学也称为濂学。周敦颐上承《周易》、孔孟之学,吸收老子的“道”和韩愈的“道统”思想,把北宋道士陈抟的《先天图》改造为《太极图》,提出了自己的《太极图说》。他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周敦颐将“无极”作为世界的本体,描绘了从无到有、阴阳对立、五行相生、变化无穷的宇宙生成图式,以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承启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流与发展,从而对湖湘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湖湘文化起源于北宋周敦颐,形成于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讲学南岳时期。胡安国(1074—1138年),字康侯,福建崇安人,人称武夷先生。北宋末年,由于金兵入侵,胡安国与其儿子胡宏等从荆门迁居南岳,后筑碧泉书院,授徒讲学,始成为湖湘文化最初创立的先驱者。

湖湘文化的真正奠基人为胡安国之子胡宏。胡宏(1105—1161年),字仁仲,因长期隐居南岳五峰之下,故世称五峰先生。他的主要著作有《知言》、《中兴业》、《易外传》、《论语指南》等,《知

言》是其代表作。在其论著中,胡宏提出了“性”的宇宙本体观,认为“性”先于宇宙万物而又派生出宇宙万物。虽然这种理论仍未跳出唯心主义的范畴,但由于其理论的出发点不同,因而引发了他对其他学派的思想 and 观点的看法也大不相同。如在对待“性善性恶”论、“天理人欲”观的问题上,胡宏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众所周知,人性“善”还是人性“恶”,自古以来就是各家各派争论的热门话题。孔孟坚持“性善”说,荀子主张“性恶”说。而胡宏却认为,人性本无“善”、“恶”,因此,圣人和凡人的区别不是由先天的“性”来决定的,而是后天的修炼而成的。在“天理人欲”的问题上,胡宏提出了“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的观点,认为天理人欲是不可分割的,天理中有人欲,人欲中有天理,故此,肯定天理而否定人欲、肯定人欲而否定天理的说法都是不对的。胡宏先后讲学于碧泉、文定、道山等书院达 20 余年,当时“远邦朋至,近地风从”。清人全祖望高度评价胡宏说:“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① 张栻也赞颂其师胡宏道:“力行所知,亲切至到,析太极精神微之蕴,穷皇王制作之端,综事理于一原,贯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见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发无声无臭之妙。使学者验端倪之不远,而造高深之无极。”^② 可以说,正是胡宏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

此后,胡宏的高足张栻将湖湘学派发扬光大。张栻(1133—1180年),字敬夫,号南轩,四川绵竹人,是南宋抗金名相张浚的儿子。他于 1161 年遵父命去南岳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③,张栻学成后,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创建城南书院,授徒讲学。后湖南安抚使刘珙重修岳麓书院,邀请张栻主教。当时正逢朱熹自福建崇安来长沙岳麓书院讲学,吸引了大批学子前来听讲,以至

① 《胡宏集》,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11 页。

② 《胡宏集》,第 338 页。

③ 《宋元学案·元城学案》,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一时與马之众,饮池水立涸”,开创了湖湘自由讲学的空前盛况。张栻与朱熹交流思想,切磋学问,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双方的学术思想也得到了共同的发展。黄宗羲评价张栻之学时说:“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①正是在张栻讲学岳麓书院期间,湖湘学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致使许多学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②。可以说,张栻是早期湖湘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继承人。

二、湖湘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张栻师从胡宏,学成后在长沙创办城南书院,主讲于岳麓书院,并广招门徒,弘扬湖湘文化精神,使湖湘学派成为南宋时期最盛的学派群体,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由于张栻既以二程的理学思想为正宗,又在本体论方面突出“心”的作用,视“心”为万物的主宰,因而带有心学的色彩;同时,他既重视义利之辨,又不尚空谈,主张以“经世”为要务,因而具有强烈的事功色彩。张栻理学思想中这种内在的矛盾性,使他的弟子无所适从,于是,湖湘学子纷纷另从他师。有的追随永嘉事功学派的陈传良,有的从朱熹问学,有的则拜陆九渊为师。因此,张栻身后,无一人得其传。

到了明末清初,湖湘学派重新复苏,其代表人物首推王夫之。王夫之(1619-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故后人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阐道湖湘,“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③。梁启超在评价王夫之时说:“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销沉,至船山而复盛。他独居讲学,并无师承。……他

① 《宋元学案·南轩学案》。

② 《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三,《答刘公度》。

③ 《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38页。

的学风,与程朱比较接近。不过谓之程朱,毋宁谓之横渠。横渠作《正蒙》,船山的中心著作为《正蒙注》。横渠于书本之外,注重观察自然现象,船山也受他的影响,其精神是比较近于科学的。张学自南宋断绝几百年,至清初又算继续起来。”^①王夫之不仅继承了湖湘学派的基本思想和观点,而且还结合时代的特点将其发扬和光大,其主要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湖湘学派历来重视性理之学,王夫之不仅继承了这一学风,而且将认识论引入其中,赋予湖湘之学以唯物主义的内容。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谈道:“西方哲学家,前此惟高谈宇宙本体,后来渐渐觉得不辨知识之来源,则本体论等于瞎说,于是认识论和伦理学,成为哲学之主要部分。”^②王夫之正是从认识论的前提出发,阐述了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他说:“言性者皆曰:吾知性也。折之曰:性弗然也。犹将曰: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曰:尔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问其性,且问其知。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因此,他主张“问以审之,学以证之,思以求之,则实在而终得乎名。”^③在这里,王夫之所说的“问”、“学”、“思”兼含有考察、了解、验证、反省等步骤,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

张载曾在《正蒙·大心篇》中提出了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的概念,但却没有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证。王夫之则认为,“缘见闻而生之知非真知”,因为“见闻可以证于已知之后,而知不因见闻而发”。^④但他又认为,见闻之知虽不是真知,但它可以辅助真知。同时,德性之知也要见闻之知来扶持,否则德性之知将流于空疏。因此,王夫之主张两者应建立在“实有”的基础上。他说:“无

① 梁启超:《儒家哲学》,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 王夫之:《知性论》。

④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大心篇》。

则不可为体矣。人有立人之体,百姓日用而不知尔,虽无形迹而非实无;使其无也,则生理以何为体而得存耶?”^① 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认为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并强调行重于知。他说:“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② 王夫之的知行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梁启超曾高度评价王夫之说:“夫之学问渊博,和炎武不相上下,但他对于哲学有独创的见解。向来哲学家,大抵都是专凭冥想,高谈宇宙原理。夫之所注意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能知有宇宙’,‘知识的来源在那里’,‘知识怎样才算正确’,他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别的话都是空的。这种讲哲学法,欧洲是康德以后才有的,夫之生在康德前一百年,却在东方已倡此论了。”^③

其二,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胡宏的理欲观。

众所周知,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著名论断。而胡宏对此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④。王夫之对胡宏的这一观点十分赞赏,指出:“五峰(指胡宏——引者注)曰:‘天理人欲,同行异情’,黠哉!能合颜、孟之学而一原者,其斯言也。”^⑤ 认为天理人欲并非对立,“不能离欲而别有理也”^⑥。“理尽则合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于此可见,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⑦ 王夫之从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阐明了天理与人欲的辩证关系,在逻辑上为反对禁欲主义奠定了道德基础。

其三,王夫之继承了湖湘学派重视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①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诚明篇》。

② 王夫之:《尚书引义》,卷三。

③ 梁启超:《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

④ 《胡宏集》,第460页。

⑤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一。

⑥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八。

⑦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四。

湖湘学派的弟子“多留心经济之学”^①，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风。王夫之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明朝灭亡后，王夫之痛定思痛，认为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是由王阳明空谈心性轻视务实所致。他说：“姚江王氏阳儒阴释、诬圣之邪说，其究也为刑戮之民，为阉贼之党，皆争附焉，而以充其无善无恶，圆融理事之狂妄。”^②正由于有感于王阳明学说之弊端而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王夫之抛弃了明心见性的空谈，而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学。在他晚年的著述生涯中，他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治史讲学，皆以经世为致用；他的著书立传，皆有新的见解，为近代学者所喜好。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和学风为一代又一代的湖湘弟子所继承，他也因此成为湖湘文化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人物。而在湖湘学派中对王夫之思想情有独钟并颇有研究的是湖南维新派人士谭嗣同。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谭嗣同青少年时期的老师欧阳中鹄和刘人熙都是终身研究王夫之思想的专家，谭嗣同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立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指王船山——引者注)之绪脉”^③的雄心壮志。他把王夫之看成是几百年以来真正的通人，认为“文至唐已少替，宋后几绝。国朝衡阳王子，膺五百之运，发斯道之光，出其绪余，犹当空绝千古”^④。同时，他还将王夫之的思想作为维新派的理论基础，认为“惟国初船山先生，纯是兴民权之微旨”^⑤，“王船山之书，皆于君民之际，有隐恫焉。”^⑥在他看来，要拯救中国，就必须像王夫之那样，首先创立一门新的思想学说，以此感化民众，昭示来者。他说：“王船山有‘一圣人死，其气分为众贤人’之说”^⑦；“王船山先

① 《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

②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序论》。

③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页。

④ 《谭嗣同全集》，490页。

⑤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323页。

⑥ 《谭嗣同全集》，56页。

⑦ 《谭嗣同全集》，第24页。

生曰,圣人之所养,死后可化为百十贤人,贤人可化为百十庸众,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所谓‘薪火犹传死后功’也。”^①谭嗣同认为著书立说,身前可能寂寞无闻,但“此日之衔石填海,他日未必不收人材蔚起之效”^②。因此,他表示“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象,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③故此,谭嗣同决心继承和发扬王夫之思想的精华,也创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为其变法图强的斗争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

首先,谭嗣同吸收王夫之的“道器”观来丰富自己的思想,以此论述变法改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谭嗣同认为王夫之所说的“无其器则无其道”是“诚然之言”,“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中有所谓道矣。”^④为此,他进一步解释说:“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自学者不审,误以道为体,道始迷离徜恍,若一幻物,虚悬于空漠无朕之际,而果何物也耶?于人何补,于世何济,得之何益,失之何损耶?……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⑤在谭嗣同看来,器是体,道是用,道在器中,离器无道,器变道亦变,“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之可有者自须丞有也。”^⑥谭嗣同正是在阐发王夫之“道器”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变法改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其次,谭嗣同吸收了王夫之阴阳对立统一的矛盾观,阐述了矛盾对抗和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谭嗣同认为,在世界的万事万物中都包含着阴阳的对立和统一,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也。……天,阳也,未尝无阴;地,阴也,未尝无阳。”^⑦他还运用科学技术知

① 《谭嗣同全集》,第321页。

② 《谭嗣同全集》,第426页。

③ 《谭嗣同全集》,第343页。

④ 《谭嗣同全集》,第292页。

⑤ 《谭嗣同全集》,第390-391页。

⑥ 《谭嗣同全集》,第390-391页。

⑦ 《谭嗣同全集》,第245-246页。

识来进一步说明阴阳的矛盾运动。他说：“独不见夫雷乎？虚空洞查，都无一物，忽有云雨相值，则含两电，两则有正负，正负则有异有同，异则相攻，同则相取，而奔崩轰訇发焉。宇宙为之掀鼓，山川为之战撼，居者愕眙，行者道仆，懦夫孺子，掩耳而良久不怡，夫亦可谓暴矣。然而继之以甘雨，扇之以和风，雾豁天醒，霾敛气苏，霄宇轩昭，大地澄涤，三辰晶英于上，百汇孚甲振奋于下，蜚飞蠕动，雍容任运而自得，因之而时和，因之而年丰。”^① 谭嗣同的这段论述是对王夫之关于“物之相感，有同异，有攻取”，“同者取之，异者攻之”^② 等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思想的发挥，反映了谭嗣同渴望时代的暴风骤雨，体现了他勇于变革现实的斗争精神。

再次，谭嗣同吸收了王夫之“气化日新”的思想，揭示了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谭嗣同认为，天地万物无不处在变化日新之中。他说：“夫善至于日新而止矣，夫恶亦至于不日新而止矣。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缡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③ 因此，谭嗣同特别注重王夫之提倡的“趋时更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对王夫之的“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的思想表示高度的赞同，指出：“吾谓今日者即无今日也。皆自其生灭不息言之也。不息故久。”^④ 从而充分体现了谭嗣同力图变革，勇于进取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的紧迫感。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发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⑤ 的豪言壮语，并以“有心杀贼，无力回

① 《谭嗣同全集》，第36页。
②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③ 《谭嗣同全集》，第34-35页。
④ 《谭嗣同全集》，第29页。
⑤ 《谭嗣同全集》，第524页。